

第 1 章

后现代语境下的批评话语分析

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关键的主题和概念，而葛兰姆西（Gramsci）、哈贝马斯（Habermas）、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巴特（Barthes）等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对霸权斗争、全球化、知识和权力、语言和权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制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各种对这种殖民的抵制与反抗等的阐释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课题。对语言的批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苏联巴赫金学派（the Bakhtin School）的沃罗西诺夫（Volosinov）于 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但它真正作为一种立场或方法却是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西欧和拉丁美洲。当时英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如福勒（Fowler）、克莱斯（Kress）、霍奇（Hodge）等深刻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以批评的态度看待语言的政治重要性，开始了批评语言学研究；1989 年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批评话语分析”的开始。乔利亚拉奇和费尔克劳（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2-3）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于后现代的语境下，是对“后现代性”批评研究的一种贡献，其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在后现代社会变化中的作用。他们将批评话语分析视为一种批评社会科学，指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成分，并与其他成分构成辩证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应该超越阐释主义和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对立，倡导“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或者“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1），即话语实践既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又是改变社会结构的生产过程。

1.1 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和“知识”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塞德曼（2001：28）指出，“根本就没有一种社会知识的后现代范式。在后现代的旗帜下，有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和概念策略。”但是“就抛弃某些关键的启蒙假设这一点而言，所有的这些方法和策略都具有某些类同或相似。”总体而言，后现代理论家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既定的理念，都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启蒙主义，理性被尊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后现代主义把对理性的怀疑作为其最重要的标志。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被分为两类，一是帮助人们摆脱蒙昧与恐惧的“人文理性”（human rationality），二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两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相辅相成、和谐统一。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逐渐取代工具理性并不断蚕食人文理性，支撑人文理性的自由和人权渐渐被科技理性所主导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所侵蚀，从而由人类所创造的科学技术却反过来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必须不断地去适应技术。人被异化了。

哈维（Harvey，1989）对资本主义经济从以产品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从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到以消费主导生产的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转变导致了贯穿于整个现代社会中的时空压缩过程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空间的相互跨越交叉，使人们感觉似乎只有“现在”，只关注“当下”成了现代生活的典型特征。随着旅行、运输以及信息和图像传送的加速和成本的降低，空间障碍消失了，时空被日益压缩的全球化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和区域的、制度和个人的事物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因此，全球化一方面第一次使人们有机会接触许多文化传统，大范围地分享各自的经历和经验，另一方面也造成主体的分化和碎片化。后现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的、远离自然的、城市化的世界中，文化变成了“仿冒”文化，复制品与正品难以区分。这一切都导致了人与自然的隔膜，也使科技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受到破坏。

现代主义在摒弃传统现实主义以“反映论”（theory of reflection）为中心的文本创作原则的同时试图建立起以“表征论”（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为中心的新范式,而后现代主义不仅反对现实主义的旧传统,也反对现代主义的新范式;它否定任何作品的整体性、确定性、规范性和目的性,主张无限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规范、模式、中心等对文本创作的限制。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谬无序的,存在是不可认识的,因此它不再试图去表现对世界的认识,而是注重展示主体生存状况。后现代作品倾向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提倡话语的异质多元本质,主张从文本叙事、话语传达到受众接受的各个层面都引入多元化的概念,不再强求故事、结构与文本内在表达的连贯统一。

在西方启蒙文化中,区分真理与谬误并且赋予科学以作为知识之特权的做法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科学和知识一直以来都被与宗教、玄学、神话或意识形态等区分开来,而只有科学才能产生真理的主张,才能帮助人类获得进步和解放。科学与修辞以及科学与政治被置于对立的地位,这种对立以一系列相关的二元对立为基础,例如理性与情感、真理与谬误、现实与想象、意义与形式、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男性与女性、心智与身体、知识与意识形态、在场与不在场、口头语与书面语、字面的与隐喻的,等等。在这些对立中,第一项均被置于上位,因此科学是真实的、客观的、精确的和理性的,非科学则是虚构的、借喻的、主观的和非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挑战启蒙文化中的这种二元对立和中心主义的各种主张。在后现代文化中,“科学与修辞以及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或者消失了;事实与虚构、知识与偏见、科学与文学、精确的与借喻的、理性与直觉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层次被打乱,变得不稳定了”(塞德曼,2001:18)。

启蒙主义者认为,心智与客观外界是不同的,语言作为人类心智与客观世界的媒介可以反映或再现客观世界。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家一直在寻求一种可以反映社会并揭示其规律、普遍结构和逻辑的语言,他们往往将自己国家独特的发展和冲突投射到全球范围,仿佛这种特定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所有这种思想和做法都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们压制了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延续了西方世界霸权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愿望,它们只不过是为了认可某些社会模式的神话。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摒弃这种自我的和动原

的本质主义语言，将“自我”视为带有多种矛盾、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体。利奥塔（2001）表达了后现代转向的这一主题，即主体和社会领域的非中心化。在他看来，后现代的特点是在知识的领域摒弃了确定性，摒弃了支配社会及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一元化标准的原则，不再那么迷信一个一元的和一致的自我：“后现代的知识不仅仅只是当局的工具；它锻炼我们对差异性的敏感性并增强我们容忍不可通约性的能力。”（利奥塔，2001：36）。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的文化中知识会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科学知识可能成为官僚化的社会操纵工具，二是知识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会更加受到关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知识将逐渐抛弃绝对标准和普遍范畴，使人们意识到并容忍各种社会差异、话语含混和冲突。

后现代社会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传媒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经历和知识渠道，使得通过电视和网络等手段与遥远的他人建立和保持联系成为可能，新媒体、新传播技术已经并正在继续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传播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因此聚焦于随之而来的不受时空局限的符号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核心作用。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3）指出，现实被这些循环的符号所构成的“虚拟物”（simulacra）所取代，这种状况既为人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和可能性，又带来了很多痛苦和困惑，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归属感，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和无意义感。语言在后现代社会中被商品化了，广告和各类推销性话语在推销商品的同时其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语言审美和话语修辞普遍成为第一位的。广告等现代语篇既反映了语言商品化的统一趋势，又为受众提供了广阔的解读空间，话语的“同质性”（homogene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共存，两者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张力。在后现代文化中，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或被重新调整，各种语言实践之间的边界也随之如此：“学科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科学、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文学和文艺评论之间，哲学和文化评论之间以及高雅文化评论和大众文化评论之间的界限都已变得相当模糊，其变化之大足以令那些启蒙文化的卫道士们目瞪口呆。”（塞德曼，2001：3）话语“杂合”（hybridity）的可能性和程度急剧增加，“杂合”成为后现代话语的一个典型特征。“杂合”意味着一个语篇可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而且当人们

把不同的话语带入自己对某一语篇的解读中并通过把当下解读的语篇与在阅读过程中带入的其他语篇相结合时，就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杂合语篇。因此，后现代社会的碎片化使得要维持意义寓居于语篇之内的传统观点变得异常困难。

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碎片化的后现代文化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具有反思性，我们不得不对自己如何生活不断做出选择，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来改变社会生活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为了更好地进行这种反思，人们越来越依赖专家体系（例如专家的文章和书籍等），其生活也就越来越受控于专家系统和技术及其应用，对专家系统的有效性的信任或怀疑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后现代社会无处不充斥着权力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和知识的联系，包括技术和权力的联系。福柯用“生命权力”（biopower）这个词来指现代的权力形式：它“把生活及其机制带入了直接运算的领域并把知识/权力变成了改变人生的动因。”（Foucault, 1981b: 143）福柯重点分析了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机构中的某些微观权力技术，如教育和医疗中的考试与体检或检查等。他认为现代的权力并非来自外部的控制，而是持续不断的技术行为，各种各样的技术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规范着现代生活。

总之，在20世纪下半叶，当人类迈入后现代的文化领域时，知识成了多样化的知识；同一性被视为零碎的、多元的和渗透性的，社会和政治失去了固定的中心；人们再也不是一味地去追求普遍性和真理，而是更多地去张扬个体、差异、异质、局部性和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就像利奥塔所呼吁的，“让我们向一体性开战；让我们来为那些无法再现的事物见证；让我们来激发差异并维护这个名称的荣耀。”（勒梅特，2001: 360）

1.2 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批评观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知识界后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探索的产物，它是后现代人文研究和话语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的一个最有影响的起点。受战后西方哲

学“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和话语在形成主体性、社会制度和政治上的作用,其目标是挑战构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层次结构的基础的那些二元意义,其方法就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解构主义重视差别、知识以及话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将许多社会问题归结为话语问题;正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Foucault, 1972, 1977, 1981b),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确立了“话语”(discourse)这个概念:“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就是(也仅仅是)语言,这个知识的署名就是话语。”(勒梅特, 2001: 361)德里达对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经典文本所进行的解构性解读在欧美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所谓“解构”就是消除和分解西方文化中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是像下面这样的一些二元对立:一致性/多样性、同一性/差异性、在场/不在场、普遍性/特殊性等。“解构”就是对这些恒定意义的分离,是后现代对结构主义的在场、秩序和中心整体性的一种反击。

解构主义摒弃“整体”思想,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并对以任何形式透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进行解构,以便人们意识到思想的不稳定性和知识的无常,认识到对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一解说都是谬误的。不过,解构主义并非极端的反智论或者虚无主义,因为德里达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或者知识本身,而是对思想成为体系,或者集结成为政治力量(例如各种意识形态)的反制。德里达认为意义处在不断地流变之中,不存在终极不变的意义;他提倡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非必然的联系,其目的在于凸显能指与所指搭配的任意性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使所指脱离既定能指的依附从而扰乱固化的结构思想。由于结构具有固定性和确定性,相反的结构往往产生类似的意义,久而久之,人的头脑会由于局部结构的刺激而映射出大致全部的意义。这些被意义透支所笼罩的形而上学的先验结构被解构主义斥之为乏善可陈的守旧根源。因此,在后现代作品中开始经常可以感觉到一个看似熟悉的结构,然而很快这个感觉就会被逆预见而行或独立于结构之外的意义所打乱。这类出乎意料或出其不意的元素有助于消解读者对结构的期待,打破结构主义的整体同一性,也有助于培养读者的怀疑精神和多元心态。

后结构主义反对关于中心的各种哲学，提出了一个建立在“非中心化”（decentering）概念之上的知识政治学。勒梅特（2001：367-368）在评论后结构主义对社会学的意义时指出，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对作为非中心化的社会理论的实质的差异原则所做的确切表述。多亏了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旦世界被非中心化，社会差异的有限性就变得明显’的思想，如今有了一个重要的工作主体。例如哈丁的‘断裂的同一性’的概念，这就是后结构主义运动引起的理论转向的一个实例。”虽然迄今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在理论知识之外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世界的“真实性”通常被当作具体经验数据的来源，但后结构主义者对这种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获得的，是经过语言的中介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的。然而，这样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表征（representation），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的情境中，知识结构是需要被重新建构的。任何结构都不存在终极的意义，解释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在于事物的本身和阐释过程，现实必须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

早在20世纪60年代伽达默尔（Gadamer）就在寻求超越科技理性与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他强调认识真理的两个关键概念：“偏见”和“视域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认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解释者都内在地镶嵌于历史性之中（辛斌，2004a）。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空间和记忆的相互作用，我们总对传统产生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体验。而理解活动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并使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因此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它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偏见。伽达默尔（1999：388）对“视域融合”中的“视域”（horizon）作了这样的说明：“视域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理解的过程总是涉及两种不同的视域，即文本的视域和理解者自身的视域。文本有自己的历史视域，是因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历史存在的个人（作者）所创造出来的；理解者也有自己特定的视域，这种视域是由他自己的历史境遇所赋予的。而所谓理解无非是这两种视域的融合。视域融合意味着，理解既非由文本所决定，也非由解释者来决定，而是由二者的

统一来决定的。伽达默尔十分赞同海德格尔的“人们不只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的观点；他指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语言是一切诠释的结构因素，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所以我们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这个掌握的维度就是理解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为了突破启蒙主义由理性、整体性、中心二元性、结构性等组成的理解的固化框架，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先后提出了“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语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如同游戏一样，没有主体、没有终极目的，说话者只是沉浸在语言的交流过程里，娱乐其中。这实际上是要求后现代的叙事语言淡化中心而注重外在的叙事技巧和开放式的结尾，以使受话者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还原语言的本体地位。

福柯反对启蒙主义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都是它构造出来的产物。他从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各个方面对这种控制形式进行研究，旨在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他特别关注个人是如何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的。在古典时期，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中重建社会秩序。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幻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福柯用不可沟通性、差异性和离散性来对抗现代理性的压抑，认为那些组装我们话语理性的各种规则并不是普遍的和不变的，它们都将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并且只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有效。1970年前后，福柯从对理论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转向对社会制度和话语实践的谱系学研究，即把话语置入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揭示其中的权力机制。福柯认为“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产性过程，它把人体不断地构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它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力量。在福柯看来，“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任何时期的“知识”同时就是权力机制。

巴特曾赞成萨特（Sartre）的存在主义观点，之后转向结构主义，再后来又批判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取消结构的文本分析理论。巴特认为我们在读一个作品时总要追求作品文字后面的意义，第一次阅读是一种理解，而第二次阅读又寻到了另一种理解。作品的结构因此就不是固定的，它可以随阅读的进行而变动。他认为符号就是符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事物，意义的结构是流动可变的，但这种变动是在一个框架之内，读者也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多价解释。因此，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不是绝对的，而总是相对的。巴特（2012）把对文本的理解过程分为“可读性的”（readerly）和“可写性的”（writerly），后者要求读者就像作者一样，去创作意义和我们的现实世界。巴特把文本置于与其他文本的联系中而不是与其作者的联系中。他区分作品和文本：“作品是具体的，占用部分书籍空间（例如，在图书馆中），另一方面，文本是一个方法论的领域。……这种对立让我们想起拉康对‘现实’与‘真实’的区分：一个明摆在那里，另一个则需被证明。同样，在书店、卡片索引和课程表中可以见到作品，可是文本却根据某些规则或违反某些规则，从而把自身揭示和表述出来。作品是放在我们手上的，而文本则由语言掌控。”（勒梅特，2001：356）因此，作品是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客体，而“文本是一个永远开放的和没有限制的领域中的游戏，它们产生了这个领域，又为这个领域所产生，它们必须在这个领域中得到阐释。”（勒梅特，2001：357）

哈贝马斯把生活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前者指公民在其中商议社会和政治事务的社会空间，后者指主要以家庭为基础的私人空间。后现代剧烈地扰乱了社会生活的边界，也因此扰乱了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各种社会领域之间的语言使用边界，导致了话语和语篇中广泛存在的语言杂合，而话语实践的全球化则使这种杂合显得尤为突出。随着商品越来越具有了文化的本质，它们也越来越具有了符号或语言的性质，语言本身也被商品化了，往往受到经济动机的驱使或干预。这样的后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坏了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身份建构上的斗争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作为后现代标志的反思实质上就是语言反思，即对语言往往被用于干预和改变社会生活的意识。

拉克劳和莫夫（Laclau & Mouffe, 1985）认为维持社会封闭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对立和对抗，他们将对抗定义为“他者的存在阻碍我维持自身不变”这样一种状况。后现代的话语研究通过把葛兰姆西的霸权理论和后现代的话语理论，尤其是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结合起来探讨这种社会对立和对抗，认为葛兰姆西的所谓“霸权斗争”（hegemonic struggle）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话语实践来表达和实施的，也即霸权斗争表现为争夺控制话语实践的斗争。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变成了话语内的斗争和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当然，这并不是说整个社会只是一个单一的霸权斗争领域，而是分成许多个领域，而且这种斗争也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也表现为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斗争。

后结构主义强调社会的开放性，这包括强调社会差异、多样性和与批评“本质性”（essentialism）相关的社会身份的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社会特征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中都与话语实践以及社会的话语构成性质有关。社会生活本质上就涉及对话语开放性的限制、形成封闭的隔离以及固化差异和意义。人们因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而与话语所形成的关系是不同的，尤其是他们所参与的话语实践的开放程度和性质是随他们所属的阶级、性别、种族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认为，主体是在实践话语形态过程中由话语建构的，因而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像启蒙主义观点认为的那样是社会过程的出发点。例如，所谓的“女人”这个概念的内涵主要是话语建构的；不存在先天性的女人属性，只有在各种各样的话语形态中按性别建构的社会分割。这个意义上的主体难免是弥散的（dispersed）和碎片化的（fragmented）。强调差异性、多样性、流动性和相对性，对话沟通、求同存异，始终是后现代语境下话语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节所勾勒的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提供了关键的主题和概念，例如“杂合”“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身份”（identity）、“反思”（reflexivity）等，而葛兰姆西、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巴特等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对霸权斗争、全球化、知识和权力、语言和权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制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对这种殖民的抵制与反抗等的阐释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系列